

东盟与东南亚的海洋治理^{*}

王光厚 王 媛

[摘要] 东南亚海域是一个大国利益聚集、各类海洋挑战凸显、域内国家矛盾重重的区域,海洋治理难度极大。面对诸多挑战,近年来东盟沿着一体化的路径多渠道入手开展区域海洋治理。目前,东盟在应对东南亚海域各类海洋挑战方面的合作已经展开,东盟还构建并逐步完善了区域海洋治理机制并加强了与区域外部大国的海洋治理合作。东盟的海洋治理行动呈现出三个特点:各成员国协商一致、归属于一体化进程下的功能合作、区域外部大国共同参与。

[关键词] 东盟;东南亚;海洋治理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7)01-0014-19

DOI:10.13549/j.cnki.cn11-3959/d.2017.01.003

东盟十国中除老挝是内陆国之外,其余国家或为邻海国、或为岛国。海洋在东盟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东南亚海域是一个大国利益齐聚、各类海洋挑战凸显、域内国家矛盾重重的区域,海洋治理难度极大。面对复杂的地区海洋环境,近年来东盟展开了积极的海洋治理行动。

一、东盟海洋治理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东南亚是一个以海洋为主的地理区域,海域总面积为750多万平方公里,占东南亚地区海陆总面积的62.5%。^[1]东南亚海域主要由南海、安达曼海以及马六甲海峡、巴林塘海峡等构成。这些海域与马来半岛、巽他群岛交错分布,这使得海陆相间成为东南亚自然地貌的主要特征。独特的海洋环境在给东盟国家提供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的同时,也给东盟的海洋治理带来一系列挑战。

其一,重要的战略位置使得东南亚海域成为大国竞逐的重点区域。东南亚海域地处亚洲与大洋洲、太平洋与印度洋交汇的“十字路口”,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一方面,东南亚海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海洋贸易通道之一。自古以来东南亚海域就是连接东西方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而二战后亚太的崛起又赋予途经东南亚海域的商路以更重要的意涵。以马六甲海峡为例,目前每年通过该海峡的船只有8万多艘,这使其成为世界上航运最繁忙的海峡之一,东南亚海域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另一方面,东南亚海域是大国掌控制海权的重要支点。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制海权本质上是特定国家在世界特定海域范围内主导国际战略的能力。^[2]纵观近五百年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进而掌控制海权是世界大国成就全球霸业的必由之路,而掌控具有战略意义的狭窄航道是大国获得制海权的关键。东南亚海域主要由岛间海以及海峡构成,战略位置十分突出,而马六甲海峡最窄处仅有5.4千米系典型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狭窄航道。对于大国而言,掌控东南亚关键海域无疑有助于其获得制海权。由于本地区缺乏主导性国家,因而长期以来东南亚及其邻近海域一直是区域外部大国竞逐的对象。在进行区域海洋治理过程中,如何有效应对各大国在本地区的利益关切及其相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美关系视域下的美国南海政策研究(16BGJ041)”的阶段性成果。

互之间的矛盾是东盟面临的严峻挑战。

其二,东南亚海域存在一系列海洋治理难题。第一,东南亚海域海盗和海上武装劫掠活动十分严重。东南亚海域“地处世界上最繁忙的两条海洋航线的交汇处”,^[3]且地理环境十分复杂,这为海盗以及海上武装劫掠活动的展开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而一些东盟国家长期存在的贫困问题则为海盗的滋生提供了社会土壤。目前,东南亚海域是全球海盗和海上武装劫掠活动最为猖獗的地区,其中南海海域、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是重灾区。根据国际海洋局的统计,2014年南海海域、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共计报告发生159起海盗或武装劫掠船只事件,占全球总量的65.7%。^[4]这些海盗和海上武装劫掠活动,或登船抢劫、或绑架人质、或掠走船只,给东南亚国家以及经由东南亚地区的海洋运输带来巨大威胁。第二,东盟国家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海上恐怖主义活动的挑战。“9·11”事件后,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一度十分猖獗。印尼的“伊斯兰祈祷团”等恐怖主义组织频繁制造爆炸、绑架等活动,给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稳定蒙上沉重阴影。活跃的恐怖主义组织、繁忙的海洋航运和易受攻击的航线使得东南亚地区成为近年来全球海上恐怖主义活动的主要区域。东南亚地区的海上恐怖主义活动一旦发生不但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且还会对国际安全以及海洋商业活动造成严重冲击,因而值得东盟持续关注。另外,“9·11”事件后东南亚海域的海上恐怖主义活动与海盗活动呈现出合流的态势,这无疑给东盟的海洋治理提出新挑战。^[5]第三,东南亚及其邻近海域自然灾害多发。东南亚是全世界最易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之一,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给本地区带来严重后果。据统计,2004—2014年全球超过50%的因自然灾害而造成的死亡发生在东南亚地区,而这一时期自然灾害在本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910亿美元。^[6]面对复杂的地质、气候条件可能引发的自然灾害,如何开展有效的灾前预警和灾后救助是东盟在海洋治理中面临的又一大挑战。除了上述几个问题外,东盟海洋治理还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公海走私、海洋污染等问题的困扰。上述这些问题都具有非常明显的不可分性,因而属于国际公共问题的范畴。从理论上讲,“公共产品的性质决定了,它们的解决需要的不是单边而是多边的联合行动,不是单方面的个体决策而是更多的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全球公共政策和规划。”^[7]具体到东南亚,依托东盟机制对这些海洋问题进行集体性治理是东盟各国最为理性的选择。

其三,东盟内部复杂的政治、经济状况严重制约着东盟海洋治理活动的展开。从理论上讲区域海洋治理属于集体行动的范畴,其效能有赖于参与各方的共同努力。东盟十个成员国的发展极不均衡而且成员国间各种历史宿怨和现实利益冲突相互交织,致使一些东盟国家在进行集体行动时或能力不足、或意愿欠缺、或两者兼具。一方面,尽管个别东盟国家已进入发达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但是东盟中的印尼、菲律宾、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六国普遍面临着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这使得它们缺乏必要的参与海洋治理的能力。另一方面,东盟一些国家之间“因海洋资源的获取、领海和大陆架疆界的划分问题而出现的争端”^[8]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东盟海洋治理活动的展开。例如,仅马来西亚一国就同文莱、新加坡、印尼、越南等国之间存在海域划分或岛屿归属争端。这些与海洋息息相关的争端事关一国主权领土完整,很难在短时期内获得解决。这种状况的存在充分反映了东盟各国在海洋治理问题上的利益差异,直接影响到东盟国家之间的互信及其参与海洋治理活动的意愿与决心。

总之,无论从自然地理还是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状况来看,东南亚地区的海洋环境都是十分复杂的。由于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环境的限定,在对各类海洋挑战进行治理的时候,如何处理好东盟成员国内部的矛盾以及如何应对各外部大国在本地区的利益关切,是东盟必须面对的更为严峻、更具挑战性的问题。

二、近年来东盟的主要海洋治理行动

东盟成员国均为中小国家,有限的国力使得单一国家难以有效应对东南亚地区复杂的海洋环境和挑战,因而依托东盟机制开展区域性的海洋治理成为东盟国家的必然选择。这正如2003年10月东盟国家领导人签署的《东盟第二协调一致宣言》所言:“海洋问题与担忧本质上是跨境性的,因此应通过全面的、整体的和综合的方式来进行区域性治理。”^[9]近年来,东盟针对本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海洋挑战,沿着一体化的路径展开了一系列区域海洋治理行动。

首先,对东南亚海域所面临的各类海洋问题进行专门治理。尽管东盟国家在海洋治理问题上立场观点不同、利益诉求各异,但是为了有效应对东南亚海域频繁出现的各类海洋挑战这一共同威胁,近年来东盟国家依托东盟机制开展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海洋治理活

动。在打击海盗和海上武装劫掠方面,东盟经历了一个从次区域合作走向区域合作的历程。早在1992年,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三国就达成《联合防治海盗对策协议》,展开打击海盗的联合行动。其后,打击海盗和海上武装劫掠活动开始成为东盟各国共同关注的议题。1998年东盟正式将海盗纳入跨国犯罪范畴、2006年东盟国家与中国等国签署了《地区反海盗合作协议》、2008年东盟成立了反海盗特别行动小组。通过这些举措,东盟建立了反海盗的法律框架、进行了一系列联合反海盗培训、加强了有关国家间的反海盗情报共享。尽管东盟的这些努力一度取得显著成效,但是由于近年来全球经济持续低迷,进入2010年后东南亚地区的海盗活动出现反弹。^[10]这意味着东盟的反海盗行动任重道远。在反恐方面,自“9·11”事件以来东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2001年通过了《东盟联合反恐行动宣言》、2002年通过了《关于恐怖主义的宣言》、2003年建立了东南亚反恐中心、2005年启动了犯罪情报数据库系统、2007年通过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反恐文件——《东盟反恐公约》、2009年通过了《东盟反恐全面行动计划》。打击海上恐怖主义活动是东盟整个反恐行动的重要领域之一,因而在上述举措中多有体现。例如,《东盟反恐公约》的第2条就认定了1988年通过的《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以及2005年通过的《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2005议定书》所列举的恐怖主义行为。^[11]在应对各类突发性自然灾害方面,伴随一体化的深化,近年来东盟亦有所作为:2003年成立了灾害管理委员会、2005年通过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东盟灾害管理与紧急应对协议》、2011年正式启动人道主义救援协调中心、2013年通过了《增强灾害管理合作宣言》、2015年发布了《制度化东盟、东盟共同体和东盟人民对灾害和气候变化抗御力宣言》。在具体的实践中,近年来东盟在应对热带风暴“纳尔吉斯”、台风“凯萨娜”、台风“海燕”等所造成的灾害方面均发挥了一定的建设性作用。^[12]

其次,构建和完善东南亚海洋治理机制。区域治理是一项集体性行动,因而其形成与发展有赖于各类国际机制的构建与完善。为有效推进和规范东南亚的海洋治理行动,近年来东盟积极致力于专门的海洋治理机制的建设,其最主要成果是创设了东盟海事论坛及其扩大会议。为推动东盟海事合作,2009年东盟第14届首脑会议通过的《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宣布将建立东盟海事论坛。^[13]2010年7月,首届东盟海事论坛会议在印尼召开,各方就互联互通、海事安全、

人员与船只搜救等问题进行了探讨。2012年10月,第三届东盟海事论坛和首届东盟海事论坛扩大会议在菲律宾召开。本届海事论坛的议题涉及东盟海事安全与合作、确保航行自由与打击海盗、保护海洋环境、促进生态旅游及渔业管理等,而扩大会议则围绕与会各方共同关心的海洋议题展开讨论。东盟海事论坛及其扩大会议的目标在于“推动地区海事安全建设”、“推动海事行为规则和规范的构建”、“培育并深化地区国家间的合作,最终建立东盟安全共同体。”^[14]尽管从总体上看目前东盟海事论坛及其扩大会议只是一个介于“第一轨道外交”和“第二轨道外交”之间的协商机制,但是作为一个区域性的、专门性的海事合作机制,该机制的创设对于各方在海事问题上增进互信、加强共识、展开合作无疑是有所裨益的。东盟地区论坛是东盟进行海洋治理的又一重要机制。东盟地区论坛始创于1994年,系目前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多边官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海事安全合作是东盟地区论坛自成立以来一直都在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成效较为显著的领域之一。1994年首届东盟地区论坛会后发表的声明即明确表达了对海洋安全问题的关切。^[15]其后,海洋安全问题成为历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关注的重点议题。与此同时,通过东盟地区论坛框架下的预防性外交、建立信任措施、灾害救助、跨地区犯罪、预防恐怖主义等主题会议,与会国对地区海洋问题进行了专门性的深入探讨和交流。2003年6月东盟地区论坛还专门发表了《关于反海盗和其他安全威胁合作的声明》。^[16]近年来,在东盟地区论坛框架下,相关国家召开了多次关于海上安全的会间会议以及关于海上航道安全和海上风险管控与安全合作的主题研讨会。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一些国家依托东盟地区论坛这一框架还展开了诸如海洋救灾演习之类的实质性合作。这意味着东盟地区论坛框架下的海洋治理正逐步从“建立信任措施”向“预防性外交”的方向发展。

再次,积极开展与区域外部大国的海洋治理合作。面对东南亚海域大国战略利益齐聚且彼此交错的现状,东盟选择承认美国、日本和中国等大国在东南亚海域的利益关切,进而与诸大国就东南亚海洋治理进行了广泛的合作。“9·11”事件后,美国日益重视东盟在其对外战略全局中的地位,而美国东盟间包括海洋治理在内的全方位合作也随之展开。2013年10月首届东盟—美国峰会后发表的声明指出:“我们欢迎东盟与美国通过能力建设、信息分享和技术合作而进行的海事合作的进一步发展。这包括海洋安全、研究、救援和

本地区的自由航行。”^[17]2015年11月东盟与美国正式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而海洋合作被列为双方优先合作的领域之一。海洋治理是近年来东盟与日本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2013年11月东盟与日本特别首脑会议后发布的《东盟—日本友好与合作愿景声明》指出双方要加强“跨国犯罪和海洋安全”方面的合作,并指出将支持东盟在互联互通方面所做的努力。该《愿景声明》还强调要“加强东盟与日本在本地区空中和海上联系方面的合作”。^[18]东盟与中国的海洋治理合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其后随着双边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取得突破:2002年东盟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明确了彼此海洋合作的方向;2003年10月东盟与中国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而海洋合作正式成为双方合作的十大领域之一;2005年12月,中国—东盟海事磋商机制正式启动,此后在该机制下双方定期就海洋环境保护、海上搜救等问题进行合作与磋商;2011年中国宣布设立“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东盟方面予以积极回应。除了与各大国开展“东盟+1”类型的海洋治理合作外,东盟还借助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机制与各大国就东南亚地区的海洋治理问题进行多边形式的探讨与合作。

总体上看,东盟业已展开的海洋治理活动基本上属于低级政治范畴,而已有的海洋安全合作大多尚处于建立共识层面,这表明目前东盟的海洋治理依然处于较低层次。尽管如此,从区域治理的角度来看,东盟面对诸多挑战而展开的这些海洋治理行动不但提升了东盟各成员国参与海洋治理的意识与共识,增强了它们共同抗御海洋风险的能力,而且还协调了东盟与区域外部大国在东南亚海域海洋治理方面的矛盾和共同利益关切,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本地区整体海洋环境的提升。

三、东盟海洋治理行动的特点

东盟的海洋治理行动是针对本地区特定的海洋自然环境和地缘政治、经济环境而展开的区域一体化行动。由于东盟的一体化发展有其自身的特色,这赋予东盟的海洋治理行动以较为鲜明的区域性特点。

首先,东盟在进行海洋治理的时候坚持各成员国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东盟的海洋治理行动是其一体化不断深化的产物。东盟在推进一体化的过程中根据本地区的具体状况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决策方式——“东盟方式”(the ASEAN Way)。这一决策方式的“核

心是坚持互不干涉内政,坚持通过非正式协商来达成全体一致的原则。它要求东盟在组织和决策上具有非正式性、非强制性的特点,不谋求建立具有约束力的超国家权力机构,强调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追求国家间的绝对平等。”^[19]“东盟方式”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文化传统、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其一,印尼有着充分协商、一致同意的决策传统,这为“东盟方式”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因;^[20]其二,绝大多数东盟国家在二战后方才取得民族国家的独立,因而对主权权益特别珍视,不愿在一体化进程中做出主权让渡;其三,东盟国家间错综复杂的历史纠葛与现实利益冲突使得一些国家即使在一体化推进过程中依然彼此猜忌,而东盟国家间的发展差距和宗教文化上的差异则使得它们在一些问题的认知上多有不同。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东盟沿袭欧盟“大国主导”、“主权让渡”的方式来推进其一体化进程必将因为各方的矛盾与冲突而寸步难行。以非对抗性的“非正式协商”来寻求“全体一致”的“东盟方式”意在寻求东盟国家间的最大公约数,因而能够最大限度的维护东盟国家之间的团结,遂成为东盟推进一体化唯一可行的决策方式。^[21]实践表明,内部充满重重矛盾和差异性的东盟之所以能在一体化道路上稳步向前发展与“东盟方式”的有效运用密不可分。东盟在进行海洋治理的时候亦依循“东盟方式”这一决策模式。一方面,为避免矛盾与纷争的出现,东盟目前的海洋治理行动主要集中在符合东盟各国共同利益需要、容易取得共识的功能性领域;另一方面,当遇到无法逾越的敏感性问题,如南海问题时,为保持团结、避免分裂东盟一般多做一些原则性的回应,如果各方矛盾实在无法调和则以放弃发表《共同声明》等方式来加以处理。尽管对于“东盟方式”的效能无论在东盟内部还是在外部世界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鉴于东南亚地区海洋环境的复杂性,在可预见的未来以协商一致为特征的“东盟方式”仍将是东盟进行海洋治理的基本决策模式。

其次,东盟的海洋治理系东盟一体化进程中的功能性合作。东盟海洋治理的最直接目标是有效对东南亚海域频繁发生的海盗、海上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等海洋挑战。这些区域性公共问题从总体上看具有强技术性、低政治性的特征,因而均属于功能领域的问题。功能主义理论认为某些特定功能领域中的问题,如稀缺资源管理、公共卫生保健问题等,单个国家无法自己解决,因而产生了多国合作的必要。进而,该理论认为这类技术性的、非政治性的功能领域的合作将产生外溢效应,扩散到其他具有共同利益的功能领域,从而推

动形成坚实的合作网络和各类国际机制。作为地区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功能性合作所产生的外溢效应最终将推动区域一体化目标的实现。^[22] 东盟的一体化发展亦肇始于功能领域的合作。虽然早在 1967 年东盟就宣告成立,但是冷战时期的东盟基本上是一个具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安全组织,制度化程度低,且并不以一体化为其追求目标。^[23] 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东盟的一体化进程才真正启动,其标志是东盟自由贸易区目标的确立。伴随东盟国家间生产贸易领域合作的深化及由此而产生的共同利益的增多,东盟既有的各类区域合作机制得以不断完善而新的区域合作机制得以创设,与此同时东盟机制下各成员国的合作也逐步由经贸领域向教育、卫生、文化、交通乃至外交、军事等新领域拓展。东盟的海洋治理就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功能性合作。由于海洋无论在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还是安全维护方面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所以源于东盟一体化进程的东盟海洋治理本身也是东盟一体化进一步发展的推动者。既往东盟海洋治理的实践表明,该领域的合作有助于加强东盟国家间的沟通与联系、增进它们的共同利益与福祉、缓解乃至消除它们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从而推动了东盟国家地区意识与地区认同的提升。目前,海事合作业已成为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建设和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例如,《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指出东盟将“采取致力于安全航行以及东盟共同体共同关注的安全顾虑的综合性方案”;又如,“东盟愿景 2020”的《河内行动计划》将海事交通整合列为东盟区域经济整合的重点领域之一。^[24] 展望未来,东盟能否提升其海洋治理的层次,在较为敏感的海洋治理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进而带动东盟国家在其他领域一体化的发展,直接关系到东盟共同体建设的成效。

再次,东盟的海洋治理行动具有明显的区域外部大国共同参与的特点。重要的战略位置使得东南亚成为大国博弈的关键区域。历史上,中国、印度、英国、法国、日本、美国和苏联等不同时期的大国均在东南亚地区发挥过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伴随美国和苏联军事力量的撤出,东南亚地区出现“权力真空”。为避免新兴地区强国角逐东南亚这一“权力真空”,东盟选择了“大国平衡”的战略。“东盟的战略构想是:利用大国对权力的追求,使大国势力在东南亚地区达到一种平衡状态,旨在防止某个大国的势力在该地区过分膨胀,从而实现地区的安全与稳定。”^[25] 在具体实践中,东盟

主要是通过创设各种国际机制来推行其“大国平衡”战略的。东盟主导创设“10+1”、“10+3”、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区域性国际机制,同时接纳多个大国参与本地区事务之中,其背后均有着非常明显的“平衡”区域外部大国力量的战略考量。纵观近二十年东盟“大国平衡”战略的外交实践,该战略的推行使得东南亚地区出现了几个大国力量并存、相互制衡的格局。这一局面的出现使得总体实力较弱的东盟得以确保自己对本地区事务的主导权,而东盟各国的利益亦因此而得到保障或提升。如前所述,东盟在进行海洋治理的过程中主动吸纳美国、日本、中国等大国同时参与其中,其目的不仅仅是要依托这些大国的力量来推进本地区的海洋治理,与此同时还力求实施“大国平衡”战略以打造各大国相互掣肘的局面。就当前的情况来看,维持中国与美、日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是东盟的主要战略目标。在全球以及区域“权力转移”加速进行的背景下,中国与日本在东亚的战略博弈日渐加深,而中国与美国在整个亚太的战略博弈亦日趋复杂。近年来,日本和美国对南海事务的频繁介入即充分折射出中日、中美战略博弈的烈度与深度。为了不使自己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东盟在进行海洋治理的时候并没有单独倚重某一大国,而是努力维持中国、美国、日本在本地区的力量平衡。与此同时,东盟还充分利用中日、中美之间在战略上的矛盾,努力打造中日、中美相互牵制之势,以求取“渔翁之利”。

[注释]

- [1] 祁广谋、钟智翔主编:《东南亚概论》[M],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页,计算所得。
- [2] 鞠海龙:《中国海上地缘政治安全论》[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页。
- [3] Richard Sokolsky, Angel Rabasa, C. R. Neu, *The Role of Southeast Asia in U. S. Strategy toward China*, Washington, D.C.: Rand, 2000, p.10.
- [4]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ureau, “Report on Acts of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 Annual Report-2014”, http://www.imo.org/en/OurWork/Security/PiracyArmedRobbery/Reports/Documents/219_Annual_2014.pdf, 计算所得,访问日期:2016年11月23日。
- [5] See Adam J. Young, Mark J. Valencia, “Conflation of Piracy and Terrorism in Southeast Asia: Rectitude and Utilit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5, No. 2, 2003, pp. 269-283.
- [6] ASEAN, “ASEAN Vision 2025 on Disaster Management”, <http://www.asean.org/storage/2016/02/ASEAN-Vision->

- 2025-on-Disaster-ManagementAdopted.pdf, 访问日期: 2016年11月23日。
- [7] 苏长和:《国际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 [8] 郑一省:《东盟国家间领土边界争端的成因及影响》[J],《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2期,第29页。
- [9] ASEAN, “Declaration of ASEAN Concord II (Bali Concord II)”, http://www.asean.org/?static_post=declaration-of-asean-concord-ii-bali-concord-ii, 访问日期: 2016年11月23日。
- [10] 有关近期东南亚海盗以及武装劫掠船只案件数量的统计,请参考 ICC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ureau,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 (Report for the Period 1 January-31 December 2015)”, https://icc-ccs.org/index.php?option=com_fabrik&view=plugin&g=form&plugin=redirect&method=displayThanks&task=pluginAjax, 访问日期:2016年11月23日。
- [11] ASEAN, “ASEAN Convention on Counter-terrorism”, http://asean.org/?static_post=asean-convention-on-counter-terrorism, 访问日期:2016年11月23日。
- [12] 参见周士新:《东盟灾害救援评析:机制、实践与前景》[J],《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6期,第22—24页。
- [13] ASEAN, “ASEAN Political-Security Community Blueprint”, <http://www.asean.org/wp-content/uploads/images/archive/5187-18.pdf>, 访问日期:2016年11月23日。
- [14] 周玉渊:《东南亚地区海事安全合作的国际化:东盟海事论坛的角色》[J],《外交评论》2014年第6期,第152页。
- [15] ASEAN Regional Forum, “Chairman’s Statement,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Bangkok, 25 July 1994”, <http://aseanregionalforum.asean.org/component/content/article/3-content/public-library/131-chairmans-statement-of-the-1st-meeting-of-the-asean.html>, 访问日期: 2016年11月23日。
- [16] See ASEAN Regional Forum, “ARF Statement on Cooperation Against Piracy and Other Threats to Security, 17 June 2003”, <http://aseanregionalforum.asean.org/component/content/article/3-content/public-library/172-arf-statement-on-cooperation-against-piracy-and-other-threats-to-maritime-security-17-june-2003.html>, 访问日期:2016年11月23日。
- [17] ASEAN, “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1st ASEAN-U.S. Summit, 9 October 2013”, <http://www.asean.org/wp-content/uploads/images/archive/23rdASEANSummit/Chairman’s%20Statement%20of%20the%201st%20ASEAN-U.S.%20Summit%20-%20FINAL.pdf>, 访问日期:2016年11月23日。
- [18] ASEAN, “Vision Statement on ASEAN-Japan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Shared Vision, Shared Identity, Shared Future”, <http://www.asean.org/wp-content/uploads/images/2013/resources/40thASEAN-Japan/finalvision%20statement.pdf>, 访问日期:2016年11月23日。
- [19] 陈寒溪:《“东盟方式”与东盟地区一体化》[J],《当代亚太》2002年第12期,第47页。
- [20] Amitav Acharya, “Multilateralism: Is There an Asia-Pacific Wa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Analysis*, Vol. 8, No.2, 1997, p.14.
- [21] See Amitav Acharya, “Culture, Security, Multilateralism: the ‘ASEAN Way’ and Regional Order”,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19, Iss.1, 1998, pp.55-84.
- [22] See Ernst B. Haas,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the European and the Universal Proces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15, Iss.3, 1961, pp.366-392.
- [23] 韦红:《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主义的特征》[J],《世界历史》2004年第5期,第21—23页。
- [24] See ASEAN, “ASEAN Political-Security Community Blueprint”, <http://asean.org/wp-content/uploads/archive/5187-18.pdf>, and “Hanoi Plan of Action”, http://asean.org/?static_post=hanoi-plan-of-action, 访问日期:2016年11月23日。
- [25] 曹云华:《金融危机以来东盟—日本关系的变化》[J],《当代亚太》2003年第11期,第41页。

作者简介:王光厚,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博士。(长春,130117)

王媛,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博士。(长春,130117)

收稿日期:2016-09-09

CONTENT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 ROK'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Regimes: An Analysis Based on Interests and Identity Pursuit *by Li Li & Shen Dingli*

The UN leads and builds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regimes after WWII. The ROK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regimes which are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approv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nventions and implementing these conventions through adjusting laws and building institutions at domestic level; behaving actively in the UN human rights bodies, and promoting new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norms. ROK's behavior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rea can be analyzed according to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dentity pursuit. The interests come from national, Korean Peninsula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while the identity pursuit means that the ROK is seeking the "normal state" status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rough middle power diplomacy.

7 The Feasibilities and Principles of Climate Negotiation Guided by Climate Ethics *by Qi Lin*

In the course of the 21-year negotiation of the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the sovereign stat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regard climate negotiation as the opportunity for getting more interests for their own country. Since countries want to maximize their benefit and minimize their loss, climate negotiation has difficulty in achieving essential progress. So looking upon climate change as an ethic problem and turning the ethic morals of balancing between pursuing self-interest and observing others' interest into inner driving force are the key of changing the thinking of contending for power and profit. Moral pressure is not the original intention. Moral self-discipline caused by moral respect is the beginning of climate ethic's becoming effective. In order to make climate ethic really effect, four principles need to be followed: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recognition without exception, the principle of priority of common interests, the principle of taking initiative action from one's own self and the ability principle of achieving self-interest through benefiting other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4 ASEAN and Maritime Governance in Southeast Asia *by Wang Guanghou & Wang Yuan*

The sea area in Southeast Asia is difficult to govern because of aggregation of interests of big powers, outstanding maritime challenges and contradictions of regional states. In recent years, when facing those challenges ASEAN carry out regional maritime governance along the path of integration. Now, ASEAN has started cooperation to deal with maritime problems in the sea area of Southeast Asia. ASEAN has built and gradually improved maritime governance mechanisms. ASEAN has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external powers. ASEAN's maritime governance has three characteristics. Firstly, consensus is built among all member states through consultation. Secondly, it comes under func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Thirdly, the external powers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20 The New Trend of Security Structure in the Indian Ocean and Analysis of the Causes

by Li Hongmei

China is currently facing a strategic dilemma in the Indian Ocean, on one hand, the growing interests of China in this region demand that China should play a role, on the other hand, China's increasing expansion of influence will inevitably face great systemic structural pressure, especially response from India and the US. In recent years it becomes obvious that India and America please each other at the strategic level out of "common interests", but actually, "each takes what he need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e security structure of the India Ocean has the following new trends: Firstly, the US and India move gradually toward strategic union. Secondly, the United States carries out buck-passing and "off shore balancing" strategy, and the regional security structure will transform from "three-polar" into "two-polar", which is China and India, with the latter supported by the